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经济类

宏观产权结构理论

——源起、架构与应用

Macro-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 Theory:
The Origin,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曾祥炎 /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经济类

宏观产权结构理论

——源起、架构与应用

Macro-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 Theory:
The Origin,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曾祥炎 / 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宏观产权结构理论：源起、架构与应用/曾祥炎著.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5

ISBN 978 - 7 - 5096 - 3153 - 9

I. ①宏… II. ①曾… III. ①产权结构—研究—中国 IV. ①F27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2176 号

组稿编辑：张 艳

责任编辑：张 艳 赵喜勤

责任印制：黄章平

责任校对：张 青

出版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www. E - mp. com. cn

电 话：(010) 51915602

印 刷：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20mm × 1000mm/16

印 张：16

字 数：288 千字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96 - 3153 - 9

定 价：49.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010) 68022974 邮编：100836



目 录

第 1 章	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选择“中庸”	6
1.3	在历史中沉迷	9
1.4	方法论	13
第 2 章	生存、自由与人类的合作生产行为	23
2.1	人类的两大基本福利追求	23
2.2	经济学对生存问题的研究	26
2.3	经济学对自由问题的研究	29
2.4	合作生产与人类两大基本福利追求的解决	34
2.5	关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反思	42
第 3 章	企业与合作生产	49
3.1	作为合作生产组织的企业	49
3.2	企业的形成与发展	58
3.3	企业契约的作用	79
第 4 章	国家与合作生产	81
4.1	推动合作生产组织生成和发展的国家	81
4.2	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94
4.3	民主法治的作用	100
第 5 章	基于合作生产的宏观产权结构理论分析框架	103
5.1	合作生产、国家与产权制度	103
5.2	完整的产权激励：微观机制与宏观机制	115

5.3	宏观产权结构理论的分析模型	121
5.4	宏观产权结构与经济发展	134
第6章	宏观产权结构与全球工业化实践	139
6.1	宏观产权结构变迁与经济史	139
6.2	西欧的崛起与持续强大	140
6.3	美国成为霸主	144
6.4	苏联的兴衰	148
6.5	东亚奇迹	152
6.6	拉美陷阱	156
6.7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贫困	159
6.8	工业社会的经济危机：一致性的理论诠释	162
第7章	宏观产权结构与中国改革成功的内在逻辑	171
7.1	中国产权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研究的三个视角	171
7.2	转型期中国宏观产权结构的形成机理	180
7.3	宏观产权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193
第8章	路径依赖与中国未来改革	199
8.1	宏观产权结构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199
8.2	中国宏观产权结构变迁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212
8.3	结论与政策建议	222
第9章	信仰与理性	227
9.1	经济学的信仰	227
9.2	回归理性	228
参考文献		233
后 记		249

第1章 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

1.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有经济存在的弊端日益显现以及世界性私有化浪潮的兴起,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在市场制度两个基石——私有产权与自由竞争原则的信奉方面最终达成了共识。1979年以后,“私有产权神话”在美国和英国得到积极倡导和推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际社会,私有化被普遍认为是国有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开出的“良方”包括三大支柱:财政节俭、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虽然这一“良方”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实施的效果并不太好,但时至今日,私有化与自由化仍然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当然出路。

转型国家的发展现实与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完全有理由动摇“私有产权神话”:在东欧与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社会转型并未取得预想的发展效果,其中,“1990~1995年,俄罗斯经济下降幅度达38%,工业生产下降了50%,其中机器制造业下降65%~80%,高新技术产品下降90%,日用消费品下降55%,70%的食品需要进口”^①。在拉丁美洲,20世纪80年代末“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之后^②,实行了全面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结果经济不是越来越好,而

① 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革透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39.

② 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其内容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是越来越差,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①;在新自由主义的故乡——欧美国家,美国遭遇了次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欧元区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Sovereign Debt Crisis),并波及全球;而以世界银行赋予的普遍指导准则来实施改革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至今还在贫困之中挣扎。

与此同时,对私有化的过度崇拜也难以合理解释非私有产权制度下创造的诸多经济“奇迹”:计划经济体制中只有国有产权,没有非国有产权,根本不存在私有产权意义上的产权竞争效率,但苏联却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高速增长;东亚国家的“强政府”模式显然也超出了产权经济学家认为的国家的干预只应该限定在产权的初始界定上,但这种“强政府”模式却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实践更是对“私有产权神话”的有力挑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并未形成强有力的法制部门对私人产权进行充分的保护^②,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够完善,却维持了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近10%的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得比那些市场经济制度更加完善、产权制度更加明晰的许多国家还要好^③。

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理性地解释经济现象。现代产权理论尽管“有效地”解释了微观主体的生产效率问题,但却不能同样“有效地”解释国民经济增长问题。现代产权理论在解释社会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现实困境说明,有必要对现代产权理论倾向于微观与效率分析的方法及其“私有好、公共坏”的基本观念体系进行深刻反思,以探讨产权制度是如何形成国民经济增长的宏观激励,进而影响社会的长期发展。

众所周知,秉承新古典传统的产权理论一直倾向于微观与效率分析方法。一方面,经典的产权论著习惯于以有关产权的具体案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科斯(Ronald H. Coase)的《社会成本问题》就有十余个诉讼案例贯穿其中,此后,诺思(Douglass C. North)、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阿尔钦(Armen A. Alchian)、巴泽尔(Yoram

① 经济改革前的1961~1981年,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5.5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1.96%;而1981~2001年,两者的速度分别降为2.15%和0.34%,即改革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为改革前的38%。

②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03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才第一次明确提出“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4年3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才第一次进入新中国的《宪法》。

③ 比如一些亚非拉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一直遵循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实行资本主义的私有产权制度,但经济却一直比较落后。

Barzel)等,基本上沿袭了科斯的这一方法,主要通过案例(或历史变迁事例)分析来证明自己的产权理论观点。另一方面,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一直处于产权理论分析的中心位置。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试图运用“成本—收益”比对来阐明产权界定、市场均衡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内在关系,此后,诺思、德姆塞茨、张五常、阿尔钦、巴泽尔等关于产权的分析也主要是围绕如何通过界定、变更产权安排,创造或维持一个交易费用较低、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产权制度而展开。关于产权理论的微观与效率分析方法,菲吕博顿(Eirik G. Furubotn)与配杰威齐(S. G. Pejovich)曾概括性地进行了评论:“产权方法可被理解为它试图通过将效用函数与单个决策者联系起来,以系统地阐述富有经验意义的最优化问题,然后将特定的内容引入到函数中去。”^①

依据微观与效率分析方法,产权经济学家集中研究了产权的激励功能。正如德姆塞茨所说:“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的激励。”^②菲吕博顿与配杰威齐也说:“一个不难接受的基本思想是,产权会影响激励与行为。”^③在他们看来,产权的激励功能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产权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交易费用。人们确立或设置产权,或者把原来不明晰的产权明晰化,就可以使不同资产或生产要素的不同产权之间的边界确定,使不同的主体能够明确自己和别人的选择空间,结果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减少且交易费用降低了。二是产权能够将外部性内部化。特别是存在正的外部性的情况下,经济主体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他就没有动力去从事这种有利于社会的活动,但在具备产权制度保护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外部性内部化了,会给经济主体带来巨大的激励。

正是源于对产权激励功能的认识,产权经济学家不仅认为清晰的产权界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取决于产权界定的清

①③ [美]菲吕博顿,配杰威齐. 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C]//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3.

② [美]德姆塞茨. 关于产权的理论[C]//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8.

晰度,并且反复强调政府干预的非正当性^①。在他们看来,政府的作用在于为排他性产权提供保护。因为一个社会如果不建立对资源利用的排他性权利体系,就不会有任何经济秩序。只是,政府介入产权,除了保护功能外,还有可能侵犯产权,这就是政府作用于产权的两面性。因为政府一旦接管了产权保护职能并成为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它就有可能凭借其独一无二的地位索取高于其提供服务所需的租金,甚至有可能剥夺个人产权。对政府潜在的侵权行为,产权经济学家在科斯定理 (Coase, 1960)、寻租理论 (Tullock, 1967)、公共地悲剧 (Hardin, 1968) 与外部性等理论的支持下,趋于一致地予以批评^②,他们质疑“公共领域”存在的经济合理性^③,向人们灌输“私有好、公共坏”的基本观念,因为对公共领域的监管可能导致寻租,而放弃监管又可能导致“公共地悲剧”,唯有私有化,公共领域外部性的内部化才有可能使资源有效使用并导致财产价值的上升。

将“私有好、公共坏”观念运用到整个社会生产,顺理成章地衍生出产权经济学家向世人宣扬的“私有产权神话”。“私有产权神话”认为,私有产权是实现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公有产权必须受到限制。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证明,私有产权并不是灵丹妙药。不仅仅是社会主

① 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产权学家的研究有不同的侧重点,但都认为产权界定越清楚,资源配置就越有效率,经济绩效也就越高。例如,以下文献都持这种观点:一是强调交易成本的 Coase 与 Williamson: Coase 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3): 1-44; Williamson O. E.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1, 87 (3): 548-577. 二是公共选择学派的 Buchanan: Buchanan J. & Tullock G.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Buchanan J. & Stubblebine W. Externality [J]. Economica. 1962 (29): 371-384; 等等。

② Coase 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3): 1-44; Tullock G.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J]. West Economic Journal, 1967, 5 (3): 225-232;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 Science, 1968, 162 (13): 1243-1248.

③ 这里所说的私人产权,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所说的“产权”概念含义基本一致。而“公共领域”在不同的学术领域有着不同的内涵:在社会学中,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在经济学中,“公共领域”既可以指 Yoram Brazel 认为的因物品产权界定不完全而导致的“不完全的分离使得一些属性成为公共财产,进入公共领域”(见 [美] 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学分析 [M]. 费方域,段毅才译.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也可以指 O. Hart 不完全合同理论中因“谈判与签约成本”而导致的“存在未界定的剩余权利”(见 O. Hart.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在本书中,除特指 Brazel 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之外,也包括政府以律法的形式等方式使产权模糊化而产生的“公共领域”。

义的经济学家,许多身处资本主义经济当中的经济学家都对私有化的思想提出质疑甚至批评。例如: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指出,或许人们过分夸大了现代资本主义与官办企业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大型现代企业都不是由所有者来管理的,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可以证实利益驱动的组织要比其他组织更有效,这种结论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组织经济假设的必然结果^①。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进一步论证说,满足私有化的假想状态是极其脆弱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由于大型的国企与私企一样存在委托代理问题,没有理论或实践证明国有部门相比较于私人部门必然低效率^②。张夏准(Ha-Joon Chang)也是“私有好、公共坏”传统观念的坚定批评者,他相信,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例子去支持或反对国有企业,流行的信息不对称和“有限理性”,使“科层”安排(如企业)而不是“合同”安排(如市场)成为必需,因此,福利经济学的理想世界很可能高估了市场而相应低估了政府在经济长期增长中的作用^③。赫德森(Michael Hudson)同样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相信的私有化在本质上比公共运营和公共所有权更有效率的观点缺乏依据,美国鼓吹私有化能够提高效率和推动私有化,不过是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种借口^④。

批评私有化思想的文献很多。只是,尽管角度不同,结论有异,但大多数对私有化的评价其实都是沿着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微观与效率分析方法展开的,或者说,从案例出发,分析产权制度对生产效率的作用,是大多数支持或反对私有化的文献共同特点。私有化论者认为,私有产权才能够产生有效率的竞争性市场,而公有制则是天然低效率的,国企私有可以改善企业的业绩;而公有制的支持者则试图证明,在一些情况下,公有制相比于私有制是更有效率的。由此,那些私有化的批评者与私有化的支持者一样,也陷入了以微观生产效率来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思维误区。

在笔者看来,现代产权理论在解释宏观经济发展方面之所以陷入困境,主要根源不在于公有制与私有制谁更有效率,而在于现代产权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用微观的效率分析来解释宏观经济发展,没有充分考虑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微观、宏观经济分析的巨大差异,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是以资

① H. Simon.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1, 5 (2): 25-44.

②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in the New Millennium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3, 12 (1): 3-26.

③ Ha-Joon Chang.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EB/OL]. http://esa.un.org/techcoop/documents/PN_SOE_ReformNote.pdf, 2007.

④ [美] 迈克尔·赫德森. 私有化的神话与现实 [J]. 国外理论动态, 2007 (9): 19-23.

源充分利用为前提，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则往往是以资源非充分利用（包括闲置和过度使用）为条件。因此，要准确地理解产权是如何影响社会发展的，就必须赋予产权制度以宏观内涵。换句话说，要解释宏观经济发展，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可能不是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的效率问题，而是两者的宏观结构问题。

1.2 选择“中庸”

在正式分析之前，笔者有必要为自己所持的基本立场做一个简单的交代。因为，人类社会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相互碰撞、挤压、融合，成为社会科学乃至社会本身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不乏许多伟大的、持极端思维的、善意的批评者，以他们深刻的、偏执的洞见丰富学术图谱并推动历史车轮。

比如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他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者，自由是他永恒的理想，他认为，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不是经济福利，而是人的自由程度。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并深信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由个人主义出发而形成的，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因此，他批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坚决地反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认为社会主义违背人性，计划经济导致政府集权，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哈耶克的幸运在于，当他1944年发表《通往奴役之路》时，大多数人对之嗤之以鼻，而在他生命的垂暮之年，以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证，他目睹了一生中主要理念的戏剧性实现。主持这场社会变革的正是以“休克疗法”之父萨克斯（Jeffrey Sachs）为代表的哈耶克的信徒们，哈耶克的这些信徒为东欧与苏联开出了激进式改革的药方，其思想核心为“价格自由化、金融稳定化、产权私有化”，本质上是新古典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具体化，是一场哈耶克自由思想的社会实验。

然而，正如哈耶克所认为的，制度绝不是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的产物，社会只会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有机地、缓慢地发展，具有进化理性主义（Ecological Rationality）的内在特征。哈耶克的信徒们错误地相信了人们（包括他们自己）的智识和道德秉赋，违背了哈耶克的进化理性主义，相信能科学地“建构”出一个社会的转型过程，最终使社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虽然有许多学者仍然相信,俄罗斯所受的损失只是暂时的挫折,俄罗斯式的“一般均衡”改革路径在历经阵痛之后,随着宪政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相比于以“局部均衡”为改革路径的“渐进式改革”,将更有后劲,也更可持续^①,但目前的情形显然还很难证实这一点。而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乱局却足以证明以市场机制有效性为前提的瓦尔拉斯(Leon Walras)、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希克斯(Hicks, John Richard)的新古典框架无论在预测经济现象方面还是在指导社会实践上都难以令人满意。

也许,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应该”追求人性中的自由,这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原初动力,也是一个人的社会责任与道德良知,但我们“不应该”就此成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因为纯粹的市场经济只是一个虚拟世界,是无摩擦力的真空,而不是我们生活的完整的现实世界,我们完全有必要经常性地为放纵的个人自由与市场经济的诸多不足深感不安。即使是哈耶克,也曾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说:“重要的是不要把对这种计划的反对意见与教条的自由放任态度混淆起来。自由主义的论点,是赞成尽可能地运用竞争力量作为协调人类各种努力的工具,而不是主张让事态放任自流。它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只要能创造出有效的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它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心想出的法律框架,而现存的和以往的法律无不具有严重的缺陷。它也不否认,在不可能创造出使竞争有效的必要条件的地方,我们就必须采用其他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②因此,他明确支持政府对于邮政、道路、污染和工厂噪声等的管制。

要运用其他方法来指导经济活动,就必须承认组织的作用。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与自由相悖的“组织”。不论是从家庭到部落、从部落到国家,还是从作坊到企业、从企业到集团,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会有对自由的限制。有时,对自由的限制是完全有必要的,因为组织产生的“合作剩余”(Cooperative Surplus),是人类社会存在和进步的基本

^①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很多,比如: Kornai (1990)、Lipton & Sachs (1990)、Brada & King (1991)、Wiles (1995)等。其中最具代表的评述可参见论文: Jeffrey Sachs, 胡永泰, 杨小凯. 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 [J]. 经济学 (季刊), 2003 (3): 961-988. 其主要观点认为技术模仿虽然在发展初期会取得不错的绩效,但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进者的诅咒”,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因此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从根本上遏制政府机会主义。

^② [英] 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M]. 王明毅, 冯兴元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40-41.

原因。如果没有企业与企业集团,就不可能有现代的工业生产,如果没有政府以及它的制度和支撑性组织,高交易成本将使复杂的生产系统瘫痪,也不会有涉及长期交换关系的投资。因为组织而形成的这种“合作剩余”,如果上升至整个社会,就意指“社会利益”,托宾(James Tobin)曾指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受到它的热心的思想家们的鼓掌欢迎,但是个人利益只有引导到需要的方向上去,才能保证其产生有利于社会的行动动机……如果在个人与社会利益出现矛盾的时候,应考虑到社会利益的要求去改变看不见的手的定理。这种情况就需要政府为维护社会利益而进行干预”^①。由此部分地论证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的必要性。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Say's Law)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者虽然质疑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自我平衡能力,但其基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与流动偏好”三大心理定律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显然要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的“滞胀”现象负责,也要对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担负一定责任。

事实上,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纠结”与“反复”总是让政府无所适从。例如,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自由主义者认为,危机根源在于美国当局对本国住房市场的干涉,为了让本来买不起房的穷人也买得起房,美国政府迫使银行不得不向信誉高风险的人群进行住房贷款,这种重大违反市场法则的做法最终导致了次贷危机,因而摆脱危机的关键在于避免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美国次贷危机本质上是美国近30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金融理论和政策造成的,是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后果,他们呼吁“回到凯恩斯”,希望运用凯恩斯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再次挽救西方世界的危机命运。

只是,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样,并非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万能良方,它们的有效性要取决于其借以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赖于“完全竞争”的满足程度,政府干预机制的有效性则取

^① 参见[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63.

决于政府干预的合理程度。遗憾的是，自由主义者无法保证“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可以获得，凯恩斯主义者也不知道政府“看得见的手”到底伸多长才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虽然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在私有产权与自由竞争原则的信奉方面已经达成共识，但其以资本主义私有化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人类方向的“普世价值”和“历史终结”神话并没有变成现实，反而使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或许，极端主义终非理性的产物，而只是信念的存在，自由市场与国家计划就站在信念的两端，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要求我们更多地持“中庸”思想走中间路线。当凯恩斯读到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之后，他给哈耶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但他也不无善意地提醒哈耶克：“你赞同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下界限，也赞同逻辑上的极端是不可取的。但是你从未向我们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限。诚然，你我划线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我猜，照我的观点，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①

在这里，凯恩斯大概将自身归类于持“中间路线”者，如果仅仅局限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他确实是：在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之间，他主张自由市场条件下的政府干预。但从对私有产权的信奉上，他却与自由主义者别无二致，同样坚守“私有好、公共坏”的产权信条。在本书中，笔者的理解是，“中间路线”的实质在于针对复杂事物的一种妥协，以求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现实世界。在私有产权与“公共领域”的作用无法严格地度量之前，对“公共领域”的简单否定本身就意味着对“中间路线”的背叛。一个真正的“中间路线”者，应该能够进行广泛的折中，以至于能够在私有产权与“公共领域”、经济物理学与经济生物学、报酬递增与报酬递减、市场自由与组织控制等几乎所有经济学的重大理论方面都找到合理的平衡。

1.3 在历史中沉迷

为了使执行的“中间路线”更趋合理，笔者将不得不同时关注经济学的抽象演绎与历史归纳方法，进而沉迷于历史。在经济思想史上，最初的方法是历史归纳方法，斯密将抽象演绎引入经济学分析，后来又经过边际革命与

^① [美]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 (Nicholas Wapshott).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

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抽象演绎方法在经济学的分析中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仍然有众多经济学历史归纳方法的坚守者,成为了主流经济学家口中的“异类”,其中最杰出者当属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基于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马克思非常强调经济学的历史特性。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认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①。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分析了几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系统,包括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古代社会,其中,马克思集中研究了支配资本主义系统运作和演化的关系与规则,据此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及其最终被共产主义替代的必然性。对历史特性的重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效地避免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误区,并走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化倾向的最前沿。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有着共同的德国哲学文化背景,同样强调历史特性的德国主流经济学理论,即历史学派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并且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立面的面貌出现^②。历史学派经历了旧历史学派和新历史学派两个发展阶段,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克尼斯(Karl Knies)、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布连塔诺(Lujo Brentano)、韦伯(Max Weber)和松巴特(Werner Sombart)等经济学家。该学派认为,抽象的理论分析是单纯推理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应当以研究历史作为研究人类知识和经济的主要来源,他们大量收集各国与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通过“历史分析法”与“历史生理法”(旧历史学派)、“历史归纳法”与“历史统计方法”(新历史学派),从根本上否定用演绎法抽象出理论,进而强调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有各自特殊的发展道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发展。

尽管我们不能将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相提并论,但是我们应充分肯定历史学派强调从历史中抽象理论的方法。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60-161.

② 19世纪德国哲学界的支配性人物是黑格尔(Georg Hegel),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历史握有社会科学的钥匙,这种思想不但影响了马克思,也影响了德国历史学派。

法论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这恰恰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上所缺少的。因为从经济学史看,自斯密开始的传统经济学都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普遍适用的、唯一符合自然秩序的理性的社会,这种思想得以传承和固守的结果,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历史特性的忽略和规避。霍奇逊(Geoffrey. M. Hodgson)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一书中指出,19世纪古典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分离意味着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使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研究由历史的经验主义分析方法过渡到形式主义的数理逻辑模式,这直接导致经济学对一般性理论的热衷而忽视了现象所对应的历史特性问题。

通过对普遍存在的共同特征、自然类型教条、人性本质假设、自由而不受约束的市场等的强调,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终于“消除了偶然性,实现了统一”,使经济学像物理学一样努力用一个共同的框架来解释各种不同的现象而成为“科学”。而之后,一般性理论在社会科学中所具有的巨大魅力造就了“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 Imperialism),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甚至历史学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可以看到用经济学三大分析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边际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的影子。其中,20世纪70年代,贝克尔(Gary S. Becker)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概念来解释犯罪、家庭、教育等非经济问题,被认为是发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最强音。

尽管经济学的一般性理论具有科学吸引力,也具备一定的社会解释力,但人们还是很快发现了一般性理论与所需解释的真实目标之间的巨大差别。任何科学都需要同时解释“相同”与“不同”,并且,在很多时候,解释“不同”比解释“相同”更为重要,对历史特性的忽视使主流经济学只能武断地解释“相同”,而不能解释更为复杂的“不同”。对此,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给予了恰当的批评:“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①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理论创新都与历史分析相关。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在一篇论述诺思(Douglass C. North)的理论贡献的文章中写道:“历史知识的贡献已不仅体现在理论的传授过程,而且体现在经济史理

^① 孙健,王东. 金融霸权与大国崛起[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2.

论本身的进步。总之，在斯密（Adam Smith）和凯恩斯之间所有伟大的理论家在提出其理论时均严重地依赖于历史知识。在斯密、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穆勒（John Stuart Mill）、马克思、凡勃伦（Thorstein Bunde Veblen）、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和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等理论家的著作中，对历史的这种依赖显而易见，同时在那些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包括古诺（Augustin Cournot）、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马歇尔和费雪（Irving Fisher）等人，亦是如此。”^①

当然，经济学界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虽然被认为是以凡勃伦、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米切尔等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的延续，但事实上，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更像是为了在抽象演绎与历史归纳方法之间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尽管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没有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一样，都十分重视对诸如制度、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等非市场因素的分析，确立起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以人与物的关系为研究的起点。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入边际分析和边际交易成本概念，拟合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使得各种关于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方法，并推动了诸如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经济史、产权分析和比较体制等领域中实证和理论研究的结合，使新制度经济学具有了鲜明的新古典色彩。

即使在主流经济学的内部，静悄悄的革命也在发生。20世纪80年代，主流经济学平静地放弃了对一般性理论的执着追求，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取决于假设结构和参数的博弈论受到了追捧。人们可以从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博弈论研究的关系中窥探出其中端倪，自从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3位博弈论专家开始，共有6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博弈论的研究有关：1994年，海萨尼（J. Narsanyi）、纳什（J. Nash）和泽尔滕（Reinhard Selten）；1996年，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与维克瑞（William Vickrey）；2001年，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利茨；2005年，谢林（Thomas Crombie Schelling）和奥曼（Robert John Aumann）；2007年，赫维茨（Leonid Hurwicz）、马斯金（Eric S. Maskin）以及迈尔森（Roger B. Myerson）；2012年，罗斯（Alvin E. Roth）和沙普利因

① [美] 福格尔·道格拉斯·诺思和经济理论 [M] // 约翰·N. 德勒巴克, 约翰·V. C. 奈. 新制度经济学前沿. 张宇燕等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23.